

罗愿《新安志》所据史料略考

管仁杰

提要：目前所见有关罗愿《新安志》所据史料的考述，或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判，或流于宏观性的概述，未有具体而准确的结论。据《新安志》内容及罗愿的引用和注释，可知《新安志》所采用的史料主要为当朝志书，包括徐锴《方舆记》、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祥符（歙州）图经》《徽州图经》等。此外还参考吸收了当地石刻碑记等实物资料，以及正史官文、笔记杂说、行状碑传等文献。这显示出罗愿编纂《新安志》过程中收集和利用材料的广泛性。

关键词：《新安志》 罗愿 史料

《新安志》是罗愿（1136—1184）为其家乡徽州编纂的一部地方志，全书共10卷，成于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又称为淳熙《新安志》。一般说来，方志在修纂过程中，肯定会对之前的志书及相关文献材料有所利用和采择，并相应地继承之前志书的某些内容，从而构成自身的史料来源。方志发展至宋代，逐渐趋于成熟，中央朝廷明确规定州县图经需每闰年（后改“再闰”）一造送，^① 前后志书之间的承继性更加明显。罗愿在《新安志·序》中，对前代有关徽州地区山川风土的记载作了相关介绍，曰：“新安在秦汉为黟、歙二县，汉末别于丹阳，以自为郡。……至梁萧几为新安太守，爱其山水，始为之记。又有王筠《新安记》，唐有《歙州图经》。国朝太平兴国中诏编《广记》，往往摭取之。”^② 基于以上材料，或有将上述引文中所提及的萧几山水《记》、王筠《新安记》和唐《歙州图经》等书作为《新安志》史料来源进行论述者。^③ 对此，需要先略作辨正如下。

其一，梁代萧几为新安作《记》之事，见于《梁书》本传，而史未载其《记》之名，隋唐以来公私书目中无相关著录，历代类书亦未见摘录，罗愿《新安志》中更无引用。则萧几所作之《记》，很可能只是一篇游记类文章，且早已失传。四库馆臣所撰《新安志提要》开首一段根据上引罗愿自序敷衍而成，却将萧几此《记》称之为《新安山水记》，^④ 未知何据，恐亦只是概称而已，不足为凭。其二，罗愿《新安志》引王筠《新安记》者仅3条，实皆转引自《太平寰宇记》；引唐《歙州图经》者只有1条，且明确标注出自《太平广记》。由此看来，王筠《新安记》、唐《歙州图经》两书在北宋初期虽或尚存，但至南宋年间已久废不行，罗愿并未得见其书，只是偶尔通过他书转引数条而已。总的来说，依照目前资料来看，并无证据表明《新安志》对序文中提及的萧几山水《记》、王筠《新安记》和唐《歙州图经》等书有实际的承袭和化用，上述三者与《新安志》并无明显的史源关系。

目前所见有关《新安志》史料来源的论述，或如上文所揭，存在纰漏之处；或者流于宏观层面的概述，未能具体作针对性的辨别。^⑤ 鉴于此，下面谨依《新安志》具体内容及罗愿的相

① 参见《宋史》卷163《职官志三》“兵部·职方郎中员外郎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3856页。

② 罗愿：《新安志·序》，《新安志》卷首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影印本，第8册，第7599页。

③ 如肖建新：《〈新安志〉志源考述》，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2007年第1期。

④ 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68《新安志提要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98页。

⑤ 参见阿风：《〈新安志〉的史源考察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7年第2期。

关引用、注释等，试对该书之史料来源作一些相对具体而确切的考察，以供参考。

(一) 徐锴《方舆记》。徐锴(920—974)，字楚金，扬州广陵(今江苏扬州)人。仕于南唐，官右内史舍人，与兄徐铉俱有名于江左，卒于宋开宝七年，年55，逾年而南唐入宋。徐锴精小学，著有《说文解字系传》40卷，另有《说文通释》《岁时广记》等著作。^①《方舆记》为徐锴所作，共130卷，^②亦称作《方舆志》，今已不存。王应麟《玉海》谓其书“纪郡国事迹及程途远近甚详”^③。从他书所征引的《方舆记》条目来看，该书所记内容于南北各地皆有涉及，应为一部全国性总志。

徐锴《方舆记》一书，北宋所编《崇文总目》有著录，^④至南宋末之《玉海》依然有载，且据以上所引王应麟语，其似曾亲自寓目。由此看来，徐锴《方舆记》一书在整个宋代一直都有流传，罗愿编纂《新安志》时亦能见到。罗愿《新安志》对《方舆记》(间亦将其称作《方舆志》)的直接征引共有14处，集中于《新安志》前5卷各州郡及属县的详情介绍之中。引用之目的，或为解释某地某名之缘起，或作为其他说法的一种补充以供参考，或据之勘验旧载之是非。能够看出，《方舆记》是罗愿编写《新安志》的参考资料之一。相较于诸多至南宋时已经散佚的志书，徐锴的《方舆记》约成于宋朝开国前后，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前代的某些地域史料，亦是罗愿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志书之一，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自不待言。并且，罗愿在《新安志》中对《方舆记》有多处明确的摘引。因此，徐锴《方舆记》理应视为罗愿《新安志》的史料来源之一。

(二) 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。乐史(930—1007)，字子正，抚州宜春(今江西宜春)人。初仕江南，归宋后举进士，累迁著作郎、直史馆转太常博士等职，后积官至职方员外郎，卒年78，著有《太平寰宇记》等。^⑤乐史所著《太平寰宇记》共200卷，或亦引称作《太平寰宇志》，于宋太宗年间撰成并上献，是一部全国性总志。其书对同时的周边邻国亦有介绍，内容颇为浩博。与之前志书相比，该书增收人物、风俗、诗文题咏等内容，体例更为详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论曰：“后来方志必列人物、艺文者，其体皆本于(乐)史。盖地理之书，记载至是书而始详，体例亦至是而大变。”^⑥

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有关徽州的记载，在其书“江南西道”中的“歙州”部分。^⑦罗愿在《新安志》中对此部分内容采录颇多。通观《新安志》全书，一共有18条对《太平寰宇记》的直接征引，引用时或称其为《寰宇志》，所有引用除1条在《新安志》第10卷外，其余皆聚集于第2—5卷内。并且，通过比对可知，《新安志》中所引王筠《新安记》3条，所引顾野王

^① 参见陆游：《陆氏南唐书》卷5《周徐查边列传》，《金陵全书·乙编·史料类》，南京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334—339页。

^② 参见《宋史》卷204《艺文志三》，第5156页。

^③ 《玉海》卷15《地理·地理书》“唐郡国志十道志地理志”条，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，1987年，第290页。

^④ 参见王尧臣编撰，钱东垣等辑：《崇文总目》卷2《地理类》，“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”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1册，第62页。

^⑤ 参见王偁：《东都事略》卷115《文艺传九十八》，《二十五史别史》，齐鲁书社，2000年，第14册，第1002页。

^⑥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68《太平寰宇记提要》，第596页。

^⑦ 按：歙州为徽州旧称。《新安志》卷1《州郡·沿革》载：“北宋宣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诏，改歙州为徽州。”

《舆地志》5条，实际上都是从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转引。除此之外，罗愿《新安志》尚有不少暗用或化用《太平寰宇记》之处。经笔者互相比勘，发现《新安志》中诸如“歙县”之“扬之水”“孔灵村”“废归德县”；“休宁”之“鹿碑山”“浙溪水”；“祁门”之“沿革”“祁山”；“婺源”之“石门滩”；“黟县”之“戢兵山”“仆城里”“独母寨”等条目，基本全同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载，其中有少数条目更是一字不差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作为一部全国性总志，书中涉及各个州县的具体内容并不多。“歙州”1州6县的所有内容只有1卷，而其中为《新安志》所明确征引或暗中化用的内容几占一半，可见《新安志》对《太平寰宇记》中“歙州”部分承袭之多。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应是罗愿当时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。

(三)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。《祥符州县图经》一作《祥符诸道图经》，亦简称《祥符图经》，是北宋真宗年间由李宗谔主持编修的一部全国性总志，因成于大中祥符年间得名。李宗谔(964—1012)，字昌武，深州饶阳(今河北饶阳)人，北宋名相李昉之子，官至右谏议大夫，为人风流儒雅，藏书万卷，著述颇多。^①据《玉海》所载，《祥符图经》之修，始于景德四年(1007)，其先乃是诸路州府进献图经之汇集，因各地进呈之图经体例不一，又命李宗谔等“加例重修”，最终成书于大中祥符三年(1010)十二月，凡1566卷，目录2卷，李宗谔为之序。^②其后，朝廷又将《祥符图经》“牒别写录”颁下诸路州府。^③然中经变乱，至南宋时该书已有散佚，陈骙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载，只存98卷，^④而当时诸路州府所藏一般只有本州府之《图经》，亦或有佚失。至今，则已全然不存。

《祥符图经》是一部全国性总志，可分解为各个州府图经，当时颁下诸州府者，亦为相应州府图经，其中徽州所颁者可称为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。对于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颁下后的情况，罗愿有记述云：

至大中祥符中，颁李宗谔所修《新图经》于天下，则由前诸书废不显，而官府顷罹睦寇，又失祥符所颁，特抄取计簿益之，以里魁、亭父之所隐实者编以为册余，五六十年矣。私窃悼之，兼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，稍稍附着。后得《祥符图经》于民间，则纲目粗设，益访故老、求遗事，思辑为一书，然未果就。^⑤

据此知，徽州地方官府所存之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因“睦寇”(指方腊)之乱已散佚不全，仅靠抄取、访求收得册余。罗愿对此颇为伤悼，故而早就着意于相关材料的收集，有补辑编纂之志。“后得《祥符图经》于民间，则纲目粗设”，此则说明罗愿所编《新安志》的纲目体例或为参仿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而成。可惜今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已亡，不能确知其与《新安志》在体例上有哪些具体的异同差别。然依罗愿此言，《新安志》之体例设置对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多有继承应是无疑的。

除了结构、体例，《新安志》在内容上对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的承袭亦不少。《新安志》直接引用《祥符(歙州)图经》者达29处，分布于卷1至卷8，引用时多简称为《祥符经》。

^① 参见《宋史》卷265《李昉传》附《李宗谔传》，第9140—9143页。

^② 参见《玉海》卷14《地理·地理图》“祥符州县图经”条，第273—274页。

^③ 参见《玉海》卷14《地理·地理图》“祥符州县图经”条，第274页。

^④ 据《玉海》卷14《地理·地理图》“祥符州县图经”条所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，第274页。

^⑤ 罗愿：《新安志·序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8册，第7599页。

此外，《新安志》卷3《歙县·碑碣》载“祥符中所录凡十一碑”，后详列各碑名称及碑文作者，又言“此其文或尚传，或碑与辞皆亡，甚可惜也，因为登载其目”^①。可知罗愿并未得见实物，既言“祥符中所录”，则亦是转引自《祥符（歙州）图经》无疑。诸如此类暗用而未明言者，或许书中还有更多，惜无明显证据，不便臆测。通观全书，《祥符（歙州）图经》是罗愿在《新安志》中引录最多的参考文献，且《新安志》对其书的征引不是每次仅仅引用一个简短条目，其中有一些是大段的摘录，如前“碑碣”条所引共11碑，又如罗愿在卷2《物产·羽族》末附言曰：“自困以下凡六物，《祥符经》所书。”^②在《新安志》的小字注文中，还可见罗愿所下“此为《祥符经》所言，今如何如何”，或“《祥符经》尚有某某，今无”之类按语，皆是其编写《新安志》时将《祥符（歙州）图经》作为参照范本的真实反映。

总的来说，罗愿所编《新安志》不论体例上还是内容上，对《祥符（歙州）图经》都有较为明显的依傍。

（四）《徽州图经》。《徽州图经》，编撰者佚名，今亡，前人著述中或有引用。据顾宏义先生所考，其书约纂于南宋初期，相对于《祥符（歙州）图经》而称为《新图经》或《续图经》。^③

罗愿在《新安志》中对《徽州图经》的称引共有9处，分布于卷3至卷5，多简称作《新经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罗愿对《徽州图经》的引用皆出现在小字注文之中，并且多持否定看法，认为其说“非是”。可见其引用《徽州图经》的主要目的，可能只是为了提供关于某条内容的其他说法，供读者参考。至于罗愿认同《徽州图经》所载而化用到《新安志》中的内容，则困于文献不足，难以详考。总体看来，《徽州图经》只能算作罗愿编纂《新安志》过程中的一种普通对比参考资料。

（五）当地石刻碑记。罗愿《新安志》卷8中有“进士题名”条，其所载乃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至南宋孝宗淳熙二年（1175）期间徽州籍进士名录。关于这些题名资料的出处，罗愿在书中有言曰：“进士前后皆题其名，立之学，更三贤守黄公浩、汪公藻、洪公适，为次续之。自绍兴二年以后，官以左右冠衔，则特奏名进士始不列，不可复得，辄因碑所载更订之，附于志。”^④据此可知，《新安志》卷8“进士题名”中的内容皆转录自官学所立之碑记。同时，罗愿在“进士题名”的注文中或征引他书如《进士登科记》等对碑刻记载予以补充和修正，所谓“因碑所载更订之”，亦非虚言。

此外，罗愿在《新安志》卷9《牧守·国朝》“卢宗原”条下注曰：“自此以下有壁记。”^⑤则是以下36人皆转录自官厅之壁记。书中其他明确称引当地石刻碑记者，亦尚有之，如引《先达题名牌》《宣州新兴寺碑》等。^⑥总之，当地所存各类石刻碑记等资料亦是《新安志》的史料来源之一。

（六）前代正史、野史，本朝国史诸臣传、家传、墓志铭、行状等。注重人物的收载是方志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，这一点在《新安志》中同样有所体现。全书10卷，人物所占篇幅为第

^① 《新安志》卷3《歙县·碑碣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8册，第7643—7644页。

^② 《新安志》卷2《物产·羽族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8册，第7622页。

^③ 参见顾宏义：《宋朝方志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26页。

^④ 《新安志》卷8《叙进士题名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8册，第7713页。

^⑤ 《新安志》卷9《牧守·国朝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8册，第7748页。

^⑥ 分别参见《新安志》卷6《先达·许司封》、卷9《牧守·唐·裴休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8册，第7682、7744页。

6—9卷，共4卷。其中，先达2卷，牧守1卷，义民、仙释与进士题名各1卷，所记皆为与徽州有关之各类人物。除进士题名外，对于这些人物，罗愿在书中一般采用立传的形式予以记录，而相关传记的资料来源，则大致出自前代正史、野史、本朝国史诸臣传、家传、墓志铭、行状等方面。

因《新安志》载录人物繁多，罗愿所采之资料亦互有交错，难以条理细论，今粗作归类分别，列下表以示其史料来源之大概：

罗愿《新安志》载录人物史料来源简表

	先达	义民	仙释	牧守
年代较早且具有一定声名者	正史传记		志书及《太平广记》《续仙传》等	正史传记
年代较早之普通人物		志书及当地传闻旧说		他人传记或野史、杂记中之相关记载
唐末五代人物	野史、杂记			野史、杂记
当朝具一定声名者	国史诸臣传、家传、墓志铭、行状		史书、志书及各类杂记、传说等	志书、官文、石刻文字等
当朝普通人物		志书及传闻旧说		

(七) 笔记、诗话、谱牒、神异录等。《新安志》卷10为杂录，所记为各种与徽州相关的事情，其中包括人事、诗话、杂艺、砚、纸、墨、定数、神异、记闻等内容。此部分内容繁杂，其中除记闻似为罗愿采录于乡里旧闻外，其他条目皆是通过爬梳摘引他书相关资料汇编而成，其来源相当之广博杂碎，好在罗愿于其征引内容后皆注明文字出处，今得见其史料来源之大概。

今对罗愿所注出处略作归纳，可发现《新安志》卷10的史料来源大致分为以下几类：一是笔记类，如《唐摭言》《南部新书》《谈苑》《春渚纪闻》等；二是诗话类，如《桐江诗话》《渔隐丛话》、蔡宽夫《诗史》等；三是谱牒类，如《砚谱》《文房四谱》《墨辨》等；四是神怪异闻录类，如《定命录》《稽神录》《广异记》等。罗愿对这些材料的摘引多寡不一，或一两条，或十余条，凡与徽州有关者皆录。借此，亦可略窥罗愿当时搜罗材料之范围。

通过以上对《新安志》史源所作具体考察可知，实际上前代各类志书由于相隔年代久远，加之战火、动乱等因素，罗愿当时所能见到者并不多，亦很难在《新安志》中找到明显的继承关系。相较而言，罗愿更容易接触的是宋代当朝的志书，以及其他各类史料诸如正史官文、笔记杂说、当地实物资料、行状碑传等。基本依靠罗愿个人力量修纂而成的《新安志》，主要吸收和利用的也侧重于这类文献资料，它们构成了《新安志》最明确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。

(作者单位：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)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